

东北亚走廊与
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东北亚走廊 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

王绵厚 ● 著

DONGBEIYA ZOUJANG
KAOGU MINZU YU WENHUA BAJIANG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DONGBEIYA ZOULANG
KAOGU MINZU YU WENHUA BAIJANG

东北亚走廊 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

王绵厚●著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 / 王绵厚 著. —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17. 7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 崔向东主编)

ISBN 978 - 7 - 207 - 11101 - 2

I. ①东… II. ①王… III. ①考古—研究—东北地区
②古代民族—研究—东北地区③文化史—研究—东北地区—古代 IV. ①K872.3②K289③K2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95519 号

责任编辑: 姚虹云

封面设计: 张 涛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 崔向东主编

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

王绵厚 著

出版发行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地 址 哈尔滨市南岗区宣庆小区 1 号楼

邮 编 150008

电子邮箱 hljrmcbs@yeah.net

网 址 www.longpress.com

印 刷 黑龙江艺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0 × 1230 1/32

印 张 8.5

字 数 290 千字

版 次 2017 年 8 月第 1 版 2017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7 - 11101 - 2

定 价 30.00 元

(如发现本书有印刷质量问题, 印刷厂负责调换)

本社常年法律顾问: 北京市大成律师事务所哈尔滨分所律师赵学利、赵景波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总序

崔向东

在人类文明发展和社会进步过程中,一些特殊的地理区域持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可谓“历史的地理枢纽”。这种枢纽有时是点、有时是线(廊道)、有时是面(区域),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就是典型的“历史的地理枢纽”。

“民族走廊”最早由费孝通先生提出,很好地诠释了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格局。民族走廊既是地理廊道,也是“历史形成的民族地区”。民族走廊是民族迁徙、文化交流、商贸往来和边疆控制的重要场域。“丝绸之路”由德国学者李希霍芬于1877年提出,具体指称汉代由长安出发经河西走廊至西域、中亚,远抵罗马帝国的一条中西交通线路,后泛指东西方的经济文化交通线。丝绸之路本意是贸易交通道路,但被赋予了持续的更为广阔的地域和广泛的意义,发挥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动脉”和“人类文明运河”作用。

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具有相似的功能和作用。凡是民族走廊,也必然是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之路,二者常常是一体二名。民族走廊联系着中原和边疆,丝绸之路沟通着中国与世界。我国学界一般讲“三大民族走廊”,即西北走廊、藏彝走廊和南岭走廊,而东北亚地区的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则一直被学界忽视。

一、“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的形成和路线

中国东北处于东北亚的中心区位,是一个多民族地区。历史上以中国东北为核心,很早就存在着以玉石、黑貂和丝绸等为符号的多条民族走廊和贸易之路,这些走廊和贸易之路成为东北亚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的基础。历史上东北亚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主要有:

1. 辽西走廊

结合考古学文化、自然地理和历代行政区划,人们通常把燕山山地以北,西拉木伦河以南,医巫闾山以西和七老图山以东的区域界定为辽西。辽西地区水系和山脉交错,河谷两侧山脉夹峙,中间一线蜿蜒逶迤,形成多条交通廊道,统称为“辽西走廊”。辽西走廊的南端连接着华北地区,直达中原;北端连接着广袤的东北大地,可进入到东北亚腹地,是沟通东北与中原极其重要的民族—文化廊道。辽西古廊道主要有四条,它们分别在不同时期先后形成。一是古北口——平刚——柳城道;二是卢龙——平刚——柳城道;三是无终——平刚——柳城道;四是傍海道。前三条古廊道形成较早,在红山文化时期已见雏形。辽金以前,这三条道路发挥着重要作用。辽西傍海道是由蓟出发,经无终、令支东行到临渝关,出临渝关沿渤海岸向东北行进抵达碣石。从碣石东北行经今兴城、锦州进入辽东。辽金时期,傍海道(碣石—锦州段)得到进一步开发,地位逐渐提升。明清时期,傍海辽西走廊“扼山海之冲要,为京师之樊篱”,成为中原通往东北的咽喉要道。

2.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

“北方草原丝绸之路”位于北纬 40°至 50°之间的欧亚草原地带,是最早的横贯亚欧北部草原的古代文化交通线路。“北方草原丝绸之路”由蒙古高原向西经过南西伯利亚和中亚北部,直达喀尔巴阡山脉的草原地带;向东延伸至中国东北进而深入到东北亚腹

地。从中亚北部向东,草原丝绸之路分为南北两部分。南部经阿尔泰山南麓进入阴山,沿阴山、燕山北部穿越蒙古高原直达黄、渤海沿岸。北部经阿尔泰山北部进入漠北(蒙古和俄罗斯西伯利亚草原),直至中国东北,并和黑龙江水道相连,通往东北亚腹地。从不同民族、地域和物产视角看,“北方草原丝绸之路”北道也被称为“黑貂之路”或“皮毛之路”。草原丝绸之路主要沟通北方、东北游牧渔猎民族与中亚、西亚的交往。从不同民族的视角依据不同物品而有不同命名,充分说明这条道路的多民族和国际共用性质。它是不同地区、不同国家和不同民族的共同联系纽带。

3. “海西东水陆城站”路

“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亦称“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海西”即元岭北行省以东、日本海以西,包括库页岛在内的广大地区。古代黑龙江流域和库页岛一带民族众多,唐以来与中原一直保持往来。辽金时期通过“鹰路”与黑龙江下游保持联系。元朝为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在女真聚居之地设置“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开通驿路,设置驿站,直达黑龙江下游奴儿干“东征元帅府”。明朝为确保东北边疆“使命往来”,在黑龙江下游地区设立“奴儿干都司”,在原有驿站基础上开辟“海西东水陆城站”交通线,“置辽东境外满泾等四十五站”。“海西东水陆城站”作为国家所设驿路,穿行于白山黑水之间,南与辽西古廊道相连,明代大量“丝绸诸物”由辽东“丝关”开原(今辽宁省开原)转经“海西东水陆城站”运往东北腹地乃至库页岛、北海道。“海西东水陆城站”路从满泾站渡过鞑靼海峡便进入“苦兀”(今库页岛)北端,再南下到达“苦兀”最南端白主,由白主南下越过宗谷海峡抵达北海道。上述这两条道路相连,因此也被称为“东北亚水陆丝绸之路”。

4. 海上丝绸之路

一般所谓“海上丝绸之路”,常指从中国东海南下至印度洋的海上贸易之路。实际上在东北亚也有一条“海上丝绸之路”,即从

渤海、黄海到日本海这一航路。“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由三部分构成,一是从胶东半岛经庙岛群岛到辽东半岛的航路;二是从辽东半岛向东“循海岸水行”的航路;三是环日本海的“沧波织路”。三段海路在不同历史时期构成了“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

5. 东北亚洲际陆桥与冰上走廊

在亚洲和北美洲之间,存在一条最短的洲际海上通道,即俄罗斯楚科奇半岛和美国阿拉斯加之间的“白令海峡”,亦称之为“白令陆桥”或“冰上走廊”。人类学和考古学的研究成果表明,美洲土著民族的祖先是在1万至3万年前通过白令海峡的陆桥由亚洲迁徙去的。近1万年以来,“白令陆桥”才被海水隔断,但由于这里气候寒冷,每年10月至次年3月几乎半年时间海平面处于“有不释之冰”的结冰状态,架起一座天然的“冰桥”,为人和动物的迁徙提供了便利条件,可谓名副其实的“冰上走廊”,成为亚洲与北美洲的古人类文化交流的大通道。

二、“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的历史作用和地位

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往往是重合的,这是由地理环境、民族分布和历史文化传统所决定的。从交通角度看,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具有相同的功能和作用。东北亚走廊与丝路是“历史的地理枢纽”,它连接南北、沟通东西,在文明起源、民族迁徙、文化交流、经贸往来、边疆控制、东北亚文化圈的形成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中国乃至世界历史发展演进中具有重要地位。

1. 民族走廊与文明起源

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文明因素的传播与吸收,都依靠交通,交通走廊为文明起源提供了条件,在文明起源和社会发展中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从社会史、文化史的角度来看,交通与文明起源是共生互动关系,彼此促进。“辽西走廊”所在的辽西地区是中国古代

文明起源地之一,最早出现文明曙光。红山文化时期已经形成以辽西古廊道为骨干的内外交通网络。红山文化与周边地区不同文化通过辽西古廊道相互传播、交流,不断吸收周边和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因素。诚如学者所论,“红山文化时期,既是‘彩陶之路’的东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点,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东西方文化因素在这里高度融合。”辽西古廊道实现了辽西地域与周边考古学文化之间的交流,加速了辽西地区古代文明起源进程。

2. 族群迁徙、民族融合与多元一体化

民族走廊与丝路在民族迁徙和融合上起着重要作用,这种融合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进程。东北古代民族众多,分属肃慎、秽貊、东胡和华夏四大族系,这些民族沿东北亚走廊与丝路频繁迁徙流动。纵观古代东北地区民族分布和迁徙的演变历程,东北亚走廊与丝路是民族迁徙、交流与融合的纽带,在这一纽带的连接下,东北地区成为族群迁徙融合的重要场域,在中华民族和中华文化的多元一体化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不同民族在文化认同上交集越大,文化的冲突就越小,从而形成文化的一致性,最终由民族心理上“非吾族类,其心必异”而实现“车书一家”。

3. 经贸往来与经济联系

在不同历史时期,东北各民族通过走廊与丝路实现与外界的经济联系。由于东北亚走廊与丝路连接地区的不同,贸易的物品亦各具特色。辽西走廊沟通东北与中原,中原的物品输出主要有丝绸、铁器、书籍等。在“海西东水陆城站”路沿线(“虾夷锦”之路),清朝通过“赏乌绫”和民间贸易保持同黑龙江中下游的赫哲、鄂伦春、费雅喀等少数民族的联系。日本北海道的虾夷人与黑龙江下游少数民族进行“山丹”贸易,虾夷人用海货、毛皮等获得中国丝绸、粮食。东北通过草原丝绸之路与中亚、西亚进行贸易,中亚、西亚各国的金银器、玉石、琥珀、玛瑙、珊瑚、毛织品、香料、玻璃器等由西而东进入

东北,并传到新罗,远至日本。东北输往中亚西亚的物品主要有金、洁银、零碎丝绸、黍种、肥马、牡马、黑貂、苍栗鼠等,碎绸和黍种是输自中国的产品,而黑貂和苍栗鼠等则是东北亚森林狩猎民族的特产。在走廊与丝路的沟通下,通过贸易互通有无,东西南北物产汇聚于东北,实现了农耕、游牧、渔猎民族经济联系和需求互补。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建立了区域与世界经济网络,使彼此相互依赖、互补的区域经济建立起内在联系,促进了边疆与内地、中国与国外的经济交流和贸易发展。

4. 文化传播与技术交流

走廊与丝路在文化传播、技术交流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物品与人员在走廊与丝路上的迁移流动和贸易往来,各种文化知识和科学技术也相互传播,反映了走廊与丝路在文化交流中的巨大融合力。通过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实现了文化与技术双向远距离传播与吸收,外来文化与技术在不断构建、重塑东北地域文化,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相互学习,相互影响。一方面,在不同历史时期,这种双向互动交流强化了东北亚文化的内在联系性。另一方面,在这种双向互动交流中,多民族文化融合与并存,促进了东北地域文化特色的形成和发展,推动了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

5. 国家认同、边疆控制与边疆内地化

一般而言,走廊与丝路的形成有其自然环境基础,但更受政治、经济需要的影响。有些走廊与丝路突出的是民族往来和经贸交流,而有些则突出的是国家控制,体现的是国家意志。在东北亚走廊与丝路体系中,辽西走廊最为基础,历代中原政权通过辽西古廊道实现边疆控制和国家、疆域一体化。明清时期,辽西走廊向东北与以开原“丝关”为枢纽的丝路连接,进入“海西东水陆城站”路,直达黑龙江下游、库页岛境内。向西进入蒙古“兀良哈”部,与北方草原丝绸之路衔接。向东与朝鲜的“朝贡道”相连,“历辽阳、广宁,入山海关,达京师”。以辽西走廊为核心,构成了支撑古代东北亚藩属朝贡

体系的交通网络,促进了边疆地区在政治、经济与文化上与内地的“同质化”。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在很大程度上体现着国家意志,强化着“国家”观念,维护着藩属朝贡体系,有利于少数民族的“国家认同”和边疆“内地化”进程。

6. 东亚文化圈的形成

东亚文化圈一般认为是以文字、儒教、律令制度和佛教为核心的同质文化。东亚文化中有许多共同因素,这种共同文化因素是和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密不可分的。在古代东亚文化圈,无疑汉文化是东北亚区域的主体文化。中国的物质文明、制度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东亚的影响尤为突出,而东北亚走廊与丝路在这个文化圈的形成过程中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国的儒学对朝鲜、日本等国产生巨大影响,朝鲜、日本使用中国的文字、历法、制度、礼仪等,这些都表现出与中国文化的高度认同和共通性,形成同质文化圈。

三、“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设想

2015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提出建设中、蒙、俄国际经济合作走廊,东北被纳入到“一带一路”倡议中。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既是历史的也是现实的,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既要借鉴其他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的成熟做法,更要有创新和突破。

1. 以走廊与丝路为视角构建学术框架与体系

以民族走廊和丝绸之路为视角探索中国东北、东北亚地区边疆与民族、经济与社会、历史与文化,这是研究“范式”的转换。要改变过去对问题的“点”的研究,由点到面,由静态转变为动态,体现联系、开放、互动的观点。以走廊和丝路为视角,构建新的学术框架和体系,开拓新的研究领域和方向,对民族迁徙与融合、文化传播与

融汇、古代文明起源、边疆控制与国家认同、边疆内地化进程、中华民族与中华文化多元一体化、东北亚区域合作与经济一体化、东北亚国际政治与国际关系、民族文化遗产保护、线性文化遗产开发与利用等许多重大问题做出新的解释,从而夯实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理论体系的基础,自主建构该领域的中国学术话语权。

2. 强调问题意识,加强多学科合作

“民族走廊”是民族学的一个重要命题,但它又不是一个单纯的民族学问题,它涉及各个学科和领域。走廊与丝路作为一个特殊的地理—文化系统或人文场域,尤其在“一带一路”视域下,人们赋予走廊与丝路研究以更丰富的内容和更宽阔的领域,这绝非局部视野可以覆盖,亦非单一学科所能胜任,应当是国际视野下的跨学科、跨地域、跨国别的综合研究。要把问题意识与学科意识结合起来,学科应当从属于问题,注意以问题意识统领学科,以问题意识带动学科整合,淡化学科边界,强化学科相互渗透、相互交叉,避免研究对象的碎片化,从而实现跨学科、跨区域、跨国别的学术合作和整体性、综合性、联系性的思考。

3. 理论与方法的多样化

走廊与丝路所涉及的内容十分丰富,涉及地理学、民族学、人类学、历史学、考古学、社会学、文化遗产学等诸多学科内容。同时,由于各民族走廊与丝路在地理环境、气候类型、历史传统、民族分布、文化传统和国际地缘等方面的差异性,其研究内容也必然有差异,从而体现其独特性。这些都决定了走廊与丝路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多样性。

4. 以走廊和丝路为视角进一步推动东北区域历史与文化研究

中国东北在东北亚区域处于核心地位,这不仅是在地理位置上,更体现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无论是古代还是近代,东北在东北

亚地区历史发展进程中都留下深刻的历史印记和影响。从交通角度讲,东北亚走廊与丝路也是东北交通骨干,它联系沟通着周边民族与国家。在民族走廊和丝路视域下,将东北历史、文化置于更大的地理空间、文化场域、历史背景和国际环境下去思考,将东北与东北亚历史发展联系起来,突破仅限于国内的狭窄视野,进入到一种世界话语的文化表述空间,有助于深刻认识东北历史发展与周边国家的互动性和文化的民族特性。这样的国际视野和背景将会引发更多新的思考,利于避免静态的结构分析,进而在互动的脉络中拓展地域研究的新视野,对于重新认识东北边疆与民族、历史与文化、社会与经济和东北亚各国历史发展等都有重要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5. 开展多领域研究,为东北再振兴提供学术与智力支撑

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具有历史与现实意义,因此历时性研究和共时性研究要兼顾。东北被纳入到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中,古代“民族走廊”正向当今“经济发展带”和区域经济一体化转型,东北亚走廊经济带逐渐形成。在这样的背景下,东北亚走廊与丝路研究要和现实结合起来,从现实中发现历史问题,从对历史问题的回答中为现实提供借鉴和启示。要把握时代脉搏,根据时代需要拓展新的领域和空间,展开具体课题研究,如民族走廊地区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社会文化变迁与民族关系、民族走廊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东北亚各国区域合作及经济一体化等,要将学术研究与当前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建设迫切需要解决的热点、难点问题结合起来,为东北再振兴和国际区域合作提供智力支撑和文化依据。

6. 以“文化线路”推进民族线性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

“线性文化遗产”(文化线路)强调的是特定地域空间内文化遗产的线性分布、内在联系及其相互影响,它反映的是文化多样性和整体的跨文化意义。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经过的都是民族地区,拥

有类型多样、内容丰富、特色鲜明的民族文化。民族走廊与丝路将沿线及周边地区多样性的文化遗产、“文化景观”联系起来,构建了一个连续的线性“文化载体”。历史上东北亚走廊与丝路是一条极具特色的民族历史文化沉积带,众多民族都在东北亚走廊与丝路上留下了民族文化遗迹和景观,这些遗迹、景观是历史的见证,也是走廊与丝路文化多样性和整体的跨文化体现。由于多种原因,目前很多民族文化遗产被毁坏散失,一些独特的民族文化遗产日渐消失。因此,从“文化线路”视角充分发掘文化遗产的内涵、特点,抢救和传承民族历史文化,推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利用,是东北亚民族走廊与丝路研究的当务之急。同时,为文化遗产旅游开发提供依据,打造跨国线性文化遗产旅游产品,实现文化资源的产业转化,也是走廊与丝路研究中最具现实意义的内容之一。

基于上述认识,我们组织编写了这套“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以贯穿于东北亚区域内的民族—文化—经贸走廊为视角,多学科、多角度地对东北亚区域内的中国东北地区边疆与民族、历史与文化、经济与社会等作连续、开放、互动、整体性的认识与研究,希望能推动东北亚民族走廊与丝绸之路的研究,为东北亚各国的政治合作提供历史依据,促进东北亚区域经济、文化等领域的深入交流与合作,进而寻求共同利益,推动共同发展,为建构东北亚命运共同体奠定坚实基础。

(崔向东,历史学博士、教授,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院长、环渤海文明研究院院长)

前 言

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本《八讲》(全称《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八讲》)小册子,原本是应邀为渤海大学东北亚走廊研究院所做的讲稿。后因颈椎手术未能成行。承东北亚走廊研究院崔向东院长的盛情,将这部疏浅的讲稿忝列于“东北亚走廊与丝绸之路研究丛书”系列。读过《中国东北与东北亚古代交通史》(以下简称《交通史》)的细心读者会看到,《八讲》中的主要专题,除个别内容,如“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等外,在《交通史》中已多有涉及。而此次《八讲》重新拟定为专题讲座,与《交通史》专著最大的不同,是对《交通史》所涉及的每一个专题更注重围绕一二个中心展开,在内容的表述上更加细化、深化和系统化。如第二讲“辽西大凌河古道商周青铜器窖埋藏史因探密”。在《交通史》中因为这一问题涉及诸多考古学、民族学和地理学的比较、断代等复杂问题,所以只有数百字的结论。而在《八讲》中,从大凌河古道的形成基础、几批青铜器出土的详细状况,青铜器群下限断代的标志性文物,到与北京琉璃河等铜器的比较,结合相关文献印证得出:“这批青铜器并非传统的西周初埋藏”说,而应是“战国末燕王喜避强秦败逃辽东途经大凌河古道埋藏”。并就与此相关的箕子和箕子东迁等问题提出了相应考述、涉论万余言。诸如此类,读者可以将每一讲与《交通史》的相应

章节作对照。从这个意义上讲,《八讲》可以看作对《交通史》相关专题考古、文献资料的重新细化和解读,以及对某些未展开内容的深化、补充和外延,其内容涉及中国东北和东北亚数十个学界关注的问题。

《八讲》内容组合的另一个特点是,围绕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三个主要方面,将《交通史》的纵向时代表述,改变为横向的专题表述。它的内容取舍按照作者的认识专列了八个专题。而这八个专题,从个人的认知角度,涵盖了作者多年努力的东北古地理、古民族、古文化研究等三个重点。因此《八讲》的内容也可以大体按照这三个方面分类。

其一,东北(含东北亚)古地理与交通史研究。

《八讲》中可归于这一专题的主要有四讲:“辽西大凌河古道与‘燕亳’和‘龙城’”,“辽西大凌河古道商周青铜器窖藏埋藏史因探密”,“西汉的‘第二玄菟郡’与高句丽的‘南北二道’”,“唐代渤海的四至交通与重要史迹的再考察”。另外,第七讲“燕秦汉‘辽东故塞’与戍边史迹”又涉及东北亚交通史与早期长城的考古学研究,这是把长城研究纳入古地理研究的范畴。这一专题的着眼点,是注重把古地理和交通史研究与考古学研究的结合。诸如“辽西大凌河古道商周青铜器窖藏埋藏史因探密”和“西汉的‘第二玄菟郡’与高句丽的‘南北二道’”两讲中,无论是商周青铜器埋藏史因,还是高句丽起源,从其立论的指向,考古学分析、依据及其论证的方法在本质上均属于考古学范畴。而在这一专题的大凌河古道、燕秦汉长城戍边道和渤海四至交通研究中,其“箕子东迁”和渤海交通道中的“龙原日本道”“南海新罗道”等,又涉及与中国东北地缘相连的朝鲜半岛和俄罗斯远东等地区,凸显了《八讲》以东北亚走廊考古民族与文化立题的

合理性。

其二,东北古民族与高句丽和夫余、契丹研究。

这一专题在《八讲》中多与古地理研究交叉。如“辽西大凌河古道与‘燕亳’和‘龙城’”一讲,涉及最关键的问题是对先秦燕亳民族地理和考古学文化的定位。本讲在详辩“夏家店下层文化”为传统的“先商说”失误的同时,明确提出夏家店下层文化应为燕山以北和医巫闾山以西的“燕亳方国说”。

又如“东北地域文化的‘二纵’‘二横’山系分区与古‘橐离国’”一讲,对自20世纪上半叶以来颇存争议的松花江流域,早于夫余的北夷“橐离国”王城及其考古学文化(索离沟文化)的族属提出考论。这是关系到东北长白山区系、古代橐离和夫余等早期民族历史考古的重要问题。可供关心这一问题研究的学者参阅。

再如“唐代渤海的四至交通与重要史迹的再考察”一讲,除涉及人们熟知的唐代渤海诸交通道以外,重点是对过去较少深入研究的“扶余契丹道”的考论。本讲以几十年考古调查资料为基础,从辽太祖征渤海的行军路线,追溯至“三燕”棘城和隋唐以来,辽西鲜卑和夫余、契丹的交往和争战路线。以考古发现的明确史迹为依托,点、线结合,较明确地勾勒出扶余契丹道的走向,及其历史渊源。特别在本讲结语时指出:辽西北地区,辽代头下州集中分布的地区,在许多地点都有早于辽建国以前的交通史迹。它暗示扶余契丹道的形成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研究这一专题绝不应局限于对个别地点和城址的定点考证,而应具有通盘考虑从鲜卑、夫余关系,到渤海与契丹关系等广阔的民族考古学领域。而其中的辽代契丹族的头下州的分布和头下州出现的深层历史原因,更是由此引申出来的包括北方“草原之路”在内

今后值得深入研究的辽代和契丹民族的重要课题。

其三,东北古文化与考古学研究。

与交通史研究与古民族研究相似,《八讲》中的古文化研究与考古学研究在很多专题中也有交叉,正如开篇所说,所谓古文化研究分解开来,主要是考古文化、地域文化、民族文化研究。属于这一专题的《八讲》中主要有:“中国东北三大地域文化”,“东北地域文化的‘二纵’‘二横’的山系分区”和“辽东‘二江’‘二河’上游青铜文化与高句丽起源”等。

“东北三大地域文化”纯属地域文化研究,这是缘起于2002年参与刘厚生先生主编的《中国长白山文化》执笔“考古编”。其中主要针对东北地域文化中的“泛流域文明论”,指出确认一个大的地域文化体系不应简单地套用“辽河文化”“松花江文化”“黑龙江文化”“鸭绿江文化”“凌河文化”等,而应兼具显著的地域特性、生态资源、连续的考古学文化系列,相对独立民族谱系和特色经济形态等多元综合因素。并以此初步确认,中国东北的三大地域文化应是以“辽河文明”为中脊,以“长白山文化”和“草原文化”为东西两翼的分布格局。可作为东北亚地域文化研究的抛砖引玉。

《八讲》中对东北和长白山区系文化中的“二纵”“二横”文化分区,既是地域文化分区,也具有考古学文化分区的标志性意义,但不等同于考古学“文化类型”分区。“二纵”,指辽东、辽西分界的医巫闾山和北部张广才岭。前者在古代从辽西红山文化到夏家店下层文化,都表现出医巫闾山东、西,辽西系列和辽东系列的明显差别,也是战国以后辽西、辽东两郡的分界;后者张广才岭则在从“橐离”到“北秽”的西团山文化,与岭东“莺歌岭文化”(肃慎系)的明显差别。“二横”,主要指千山和龙岗山脉。